

# 中国经济增长中数量和质量的不一致性及其理论解释

任保平 魏 婕

〔摘要〕 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不一致,表现出严重的高速度、低质量特征。这种不一致除了表现为总量视角上的不一致,还同时表现为省区视角上的不一致。由于经济增长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质量差异大、资源环境代价大,以及增长的稳定性不足和收入分配与福利状况不甚理想等问题直接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数量背离。实现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统一的条件在于如何使经济剩余能够增长社会的总福利,路径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发展创新型经济,加强资源资产化管理,推动制度创新。

〔关键词〕 经济增长数量; 经济增长质量; 一致性

〔中图分类号〕 F1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 (2012) 03-0006-05

## 一、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不一致的态势描述

### 1. 总量视角上中国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不一致

经济增长数量与经济增长质量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的质量增长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数量,不可能谈及经济增长质量。衡量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不一致,首先要分析增长质量与数量的衡量指标。本文参考任保平(2012)前期成果<sup>〔1〕</sup>,从经济增长的效率、经济增长的结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

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代价以及国民经济素质6个维度合成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IEG)<sup>〔2〕</sup>,以此作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指标;对于增长的数量,我们采用总量GDP,并以2000年为基期的真实GDP作为经济增长数量的测度指标,通过比较方式描述2000-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的基本状态。

不难发现,2000-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变动趋势是不一致的。2000-2010年的中国真实GDP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但是,自200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质量则基本上呈现为波动中上升的态势,其中2000-2004年经济增长质量呈现

〔基金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经济增长质量研究”课题(NCET-06-0890); 陕西省重点学科西方经济学建设项目(2008SZ09)

〔作者简介〕 任保平,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魏 婕,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 西安 710127。

有升有降的波动态势，而在 2005 - 2010 年表现出稳步提高的趋势。

表 1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增长数量比较

年份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真实 GDP	年份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真实 GDP
2000	-0.6930	99214.55	2006	0.5381	178052.24
2001	-0.9618	107449.67	2007	0.7289	203268.70
2002	-5.9487	117208.33	2008	0.9702	222852.96
2003	-0.1914	128958.90	2009	1.2379	243387.08
2004	0.4740	141964.46	2010	1.4349	268794.42
2005	0.3286	158020.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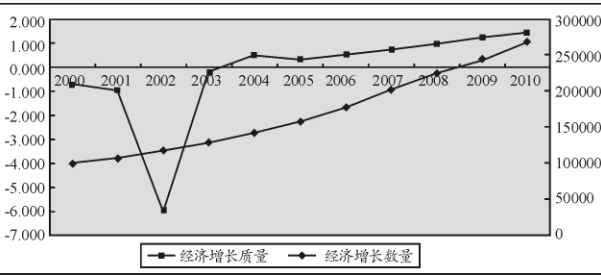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增长数量比较

在借鉴刘海英（2006）成果的基础上，<sup>(3)</sup> 我们修正了关于反映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和经济增长数量扩张不同步的系数  $\varepsilon$ ：

$$\varepsilon = \left| \frac{(b_n - b_{n-1}) / b_{n-1}}{(a_n - a_{n-1}) / a_{n-1}} \right| - 1$$

其中， $b$  代表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IEG）， $a$  代表反应经济增长数量的真实 GDP， $n$  为年份值，若  $\varepsilon = 0$ ，说明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同步扩张，反之，则说明两者呈现不一致的态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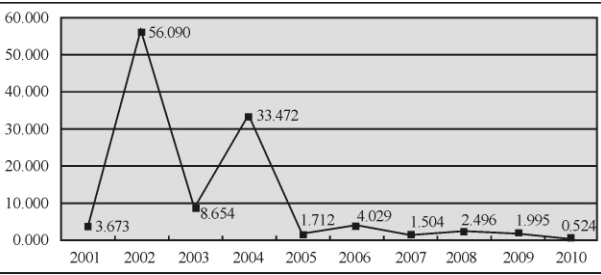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不一致的系数

由此得到 2001—2010 年的值，从图 2 可以看出，增长质量与数量不同步是常态，可喜的是最

近几年这种不同步的趋势在趋缓。但总体来看，总量视角上，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不一致是毋庸置疑的。

2. 省区视角上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不一致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的不一致，多数分析集中在总量层面<sup>(4)</sup>，其实，除了纵向的不一致，横向的省区增长数量和质量相对排名不一致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同样参考任保平（2012）前期成果<sup>(5)</sup>，通过对 2010 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增长质量状态进行考察，得出各省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IEG），以此为依据作为各省区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指数，并根据该指数大小对各省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排序，同时选择各省的总量 GDP 作为经济增长数量的主要衡量指标对其排名，列出 2010 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序及其升降状况，结果见表 2。

表 2 2010 年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增长数量的排序比较

省份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经济增长数量排名	增长数量与质量之差	省份	经济增长质量排名	经济增长数量排名	增长数量与质量之差
北京	1	13	+12	河南	22	5	-17
天津	4	20	+16	湖北	12	11	-1
河北	19	6	-13	湖南	17	10	-7
山西	25	21	-4	广东	3	1	-2
内蒙古	26	15	-11	广西	23	18	-5
辽宁	10	7	-3	海南	7	28	+21
吉林	11	22	+11	重庆	14	23	+9
黑龙江	13	16	+3	四川	18	8	-10
上海	2	9	+7	贵州	28	26	-2
江苏	6	2	-4	云南	30	24	-6
浙江	5	4	-1	陕西	20	17	-3
安徽	16	14	-2	甘肃	24	27	+3
福建	9	12	+3	青海	29	30	+1
江西	15	19	+4	宁夏	27	29	+2
山东	8	3	-5	新疆	21	25	+4

二、为什么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会产生不一致

1. 经济增长过程中投入与产出有质量差异

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人们总是要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换取最大的收益，如果投入与产出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能以较少的投入换取较高

的产出,我们便可以认为经济增长的产出质量比较高。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量投入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实现的。王小鲁(2009)等人的研究认为,1980-1990年中国资本形成率在35%上下波动,近年来进一步上升到42%左右,<sup>(6)</sup>高资本形成率是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之一。这种高投入支撑了中国经济增长数量上的奇迹,但是以投入产出效率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这种高投入、低产出、低技术含量的生产方式也致使等量的原料、资源投入所创造的价值较少,增长质量必然不高。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然需要“提高资源的组合质量和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投入,提高产出”。<sup>(7)</sup>因此,投入与产出的效率以及质量方面的差异直接导致了经济增长中数量和质量的不一致。

## 2. 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较大

追求质量型的经济增长其关键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新中国成立以来,GDP10多倍的增长是以矿产资源消耗增长40多倍的代价实现的。中国长期的资本高投入,是以资源、能源的高消耗为基础的。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火电供电的煤耗高达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达21%,水泥综合能耗高达45%。而高能耗、高投入的背后是资源环境的代价。研究称中国GDP的13.9%是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退化为代价换取的。<sup>(8)</sup>所以,即使过去多年中国经济增长在数量上成绩可观,但是由于资源环境的巨大代价,直接导致增长质量不容乐观。另外在中国地区层面上,某些地区产业软化程度较高,服务业所占比重大,其增长过程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也就较少;反之,产业结构以重化工业为主,如果政府监管不力,产权不清晰,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就较明显。这样也会导致地区在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方面相对排名的不一致。

## 3. 经济增长过程的稳定性不足

稳定增长应包含两个内容:一是经济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小,二是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次数少。<sup>(9)</sup>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最重要的维度之一,能够总体反映经济增长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态势和总体状况。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呈现出经济周期波动微波化、稳定化趋势,<sup>(10)</sup>即“大起大落”的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但同时一些地区的投资扩张冲动仍然强烈,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仍较为激烈,这使得各地区之间的宏观稳定性有显著差异,造

成地区之间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不一致。除此之外,在整个国家层面,由于受外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因素冲击,在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波动不可避免。近些年通货膨胀压力陡增也说明整个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增长质量相对于数量明显落后。

## 4. 收入分配与福利状况不甚理想

从经济增长结果来看,无论是提高经济增长的数量,还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其根本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人的生存、发展和提高人的生活水平。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工资收入占GDP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已从1997年之前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1.4%,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sup>(11)</sup>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普通民众的收入和福利却被压到了最低。同样,在收入分配方面,1952年中国基尼系数仅为0.153,到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值为0.473,基本已经肯定近些年中国基尼系数超过了“警戒”的0.4,如此差异的收入分配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矛盾的尖锐对立。除此之外,环境恶化、食品质量无保障、公共产品提供不够等也无不影响着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中国人的福利水平,使绝大多数民众无法从心底感到幸福。这种只有GDP数字意义的增长,而无所有民众共享增长成果之实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以上的偏差意味着经济增长的质和量往往是不一致的,单纯注意增长的数量不可能带来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必须将视角切换到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包括关注低效率部门的改善,资源利用的节约和生态环境的治理,熨平经济的剧烈波动以及显著改善国民的社会福利。

## 三、实现经济增长数量和质量一致的条件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做法在于转变增长方式,以及调结构和平波动。但从实质意义上讲,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实现一致性的条件在于如何使经济剩余能够增长社会的总福利。

从经济学经典理论来看,以国民收入增长为研究对象的增长理论是建立在凯恩斯主义(如哈罗德-多马模型,而且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创制也是在凯恩斯理论的指导下,由1984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理查德·约翰·斯通完成)或新古典主义基础上的。凯恩斯主义以增加就业的短期分析为主,不重视增长的后果和代价,对于凯恩斯主义而言,修建金字塔和挖坑后再填埋都是经济萧条时期可行的政策。另外,凯恩斯主义没有基于福

利或效用的微观基础，在哈罗德—多马模型中，适当的资本积累率是保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条件。因此，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经济增长分析只是针对国民收入的动态分析，没有涉及也不可能涉及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分析。

在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增长理论体系将宏观与微观相对接的过程中，目标函数逐渐从最大化国民收入转向最大化总效用或总福利，这就涉及到福利函数的假定。在福利经济学中，社会福利函数的形式因假定不同而不同，如萨缪尔森的社会福利函数是个体福利的加总，而罗尔斯的社会福利函数则由社会成员中福利最差的福利水平决定。在新古典主义的增长理论中，一般默认采用萨缪尔森型的福利函数，但暗含着如下两个条件：①增长成果具有普惠性，即经济增长会给每个人带来福利的增进，这就要求社会制度或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分配制度是合理的；②没有外部性，这里的外部性主要是负的外部性，即每个人对经济福利的追求不会对他人造成损失。基于这两点，我们才能认为社会福利函数是萨缪尔森型的，即社会福利等于个人福利之和。满足这两个条件，经济增长所生产的剩余才能成为增进社会总福利的因素，从而才会出现经济增长的质和量的统一。

另外重要的一点，以上两个条件是在传统报酬不变前提下讨论的。传统的报酬不变假定条件下，分配服从边际生产力理论，收入由技术条件决定，那么随着边际收益的递减使得单位要素的收入也呈现递减的状态。如果要素收入由要素所有者的社会地位决定，则处于弱势的一方所获收入也会因投入不断增加而递减，且递减的速度会更快。这就是传统的要素投入型增长方式的最终结果为什么会出现增长的质与量不一致的根本所在。但本文假设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要素间分配的矛盾会缓解，企业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也会得到一定的缓和，因为企业可以通过自我优化而获得增长。

因此，从理论上分析，经济增长过程中质与量的统一需要满足如下条件：①普惠的社会制度。经济增长规模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需要注意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问题，使人们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要通过消除个人背景不同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从而缩小结果的不平等。通过经济增长创造和发展机会，使得社会所有成员都可以平等利用这些机会，从而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收入和能力，促使整个社会和谐发展并步入良性循环；②权责明晰的产权

制度。产权制度不仅独自对资源配置及其效率有重要影响，而且构成市场制度以及其他许多制度安排的基础。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各类财产权，有利于各类资本的流动和重组，有利于增强企业和公众创业创新的动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和市场秩序。产权的激励功能可以使经济活动当事人达到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具有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的内在推动力。一个有效的产权制度，能够准确界定行为主体获取与其努力相一致的收益的权利，而且最核心的还在于能够抑制外部性的特别是负外部性的发生和泛滥；③规模报酬递增的制度或技术创新。数量型经济增长是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机制基础上进行的，单纯通过扩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在规模报酬递增基础上进行的，知识和技术进步是规模报酬递增的源泉，通过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效率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由于知识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导致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从而带来产出的增加。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统一，核心在于增长机制应由报酬不变转向报酬递增，由要素投入型增长转为内生增长，这其中必须注重促进规模报酬递增的制度或技术创新，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同时应注重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倡导科技、知识和技术在部门产出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

#### 四、实现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一致的路径

##### 1.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刻不容缓。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必须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数量、速度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变，由资源耗费型和环境污染型增长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增长转变，由经济社会失调型增长向经济社会协调增长转变，由低成本扩张向高效率创新型增长转变，由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转化为内生技术进步型增长，由政府投资推动的增长转化为民间投资驱动的增长，由不可持续性增长向可持续性增长转变，由出口拉动型增长向内需推动型增长转变，由结构失衡型增长向结构优化型增长转变，由高碳经济型增长向低碳经济型增长转变，由技术引进型增长向自主创新型增长转变，由“少数人”先富型增长向“共同富裕”型增长转变。<sup>[12]</sup>

##### 2. 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能使资源得到有效合理的配置，

从而提高增长质量。由于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其主导产业是不同的,因此会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对一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有重要影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应以产业结构升级为核心:一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以及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力度,提高农业的产业化水平和现代化水平。二是要转变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和提高工业经济效益,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三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重点发展附加值高的新兴产业,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四是要加大用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力度,提高研发投入,激励自主创新,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 3. 发展创新型经济

数量型经济增长是要素驱动型的增长,质量型经济增长是创新驱动型增长。要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必须发展创新型经济:一是要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同时应注重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倡导科技、知识和技术在部门产出增长中发挥主导作用;<sup>(13)</sup>二是要加快传统部门改造,加大对传统部门的技术和人力资本投入,同时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促使企业或整个行业从原先的资本驱动型或劳动驱动型增长向知识驱动型转变,以及产业结构从低层次向高层次过渡;三是要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型向技术提高型转变,由要素投入的增长转向要素效率提高的增长,促进经济增长中规模报酬递增机制的形成。

### 4. 加强资源资产化管理

实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目标,关键在于加强对资源的资产化管理。所谓资源的资产化管理就是要依据各种要素对增长的贡献大小和我

国资源禀赋状态,以产权为实质引入市场机制,改变资源行政划拨、无偿使用的运行机制,从而不断提高经济增长中要素的组合质量和配置质量;二是科学地评价与引导经济发展过程对于资源、环境的正负面影响,确保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的最佳配置状态,将保护资源放在突出位置,严格执行现有的国土资源规划,强化对资源的管理约束,加强对资源配置的调节,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三是进一步完善资源开发利用补偿机制和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使等量的投入能够带来更多的产出,改善要素供给机制。

### 5. 推动制度创新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在于改善供给,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是推动制度创新,建立与质量型经济增长要求相适应的制度。一是进行行政管理制度创新,建立科学的政府决策机制。要鼓励政府行为长期化,“政府行为长期化重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sup>(14)</sup>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决策机制;二是促进科技和教育制度创新,为改善供给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供知识、技术和人才支持。通过科技制度创新鼓励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领域和前沿核心技术领域进行创新,努力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通过教育体制的创新,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优化教育结构,推行素质教育,扩大教育资源,加快创新人才的培养;三是促进收入分配体制的创新,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过大的收入差距;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保障城镇贫困阶层和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

### (参考文献)

- [1] [2] [5] 任保平.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 2012——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各省区分析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
- [3] [4] 刘海英.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和规模扩张的非一致性实证研究 (J). 经济科学, 2006, (2).
- [6] 王小鲁, 樊纲, 刘鹏.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 (J). 经济研究, 2009, (1).
- [7] 王积业. 关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思考 (J). 宏观经济研究, 2000, (3).
- [8] 石敏俊, 马国霞. 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 关于绿色国民储蓄的实证分析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 [9] 任保平.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 2010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
- [10] 刘树成. 论又好又快发展 (J). 经济研究, 2007, (6).
- [11] 房煜, 余佼佼. 国家富了, 你富了没? (N). 就业时报, 2008-04-10.
- [12] 任保平.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 2011——中国经济增长包容性 (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
- [13] 洪银兴. 关于创新驱动和创新型经济的几个重要概念 (J). 群众, 2011, (8).
- [14] 陈钊, 陆铭. 论作为经济发展阶段之函数的政府功能 (J). 学术月刊, 2007, (10).

(责任编辑: 张琦)